

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实证分析

赵 晶, 孟维烜

[摘要] 动态政治环境下企业构建政治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战略,是企业战略研究亟待探究的重要问题。作为企业动态构建政治关系的重要渠道,官员视察通过提升企业的合法性——获取外部政治环境信息、传递企业政治关系信息——影响企业创新意愿和资源获取,继而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研究发现:①官员视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②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官员视察对不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强;③相比国有企业,官员视察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强;④官员更替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降低了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官员视察引起的合法性提升是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因素,而企业性质与既有政治关联则显著影响官员视察的创新激励效力。本文认为,提升企业的合法性有利于激励企业创新;企业战略管理不仅要关注企业政治关系构建过程的动态性,更要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建立持续竞争优势作为政企良性互动的核心目标,统筹企业政治关系构建策略。

[关键词] 企业政治关系; 组织合法性; 官员视察; 企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6)09-0109-18

一、问题提出

持续创新是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1]。自2006年政府提出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不断增长。然而,由于企业家创新意愿不足、创新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缺乏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等问题的困扰^[2],如何激励企业提升创新水平仍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与实践亟待探究的重要问题。自熊彼特开创性地探讨规模和垄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后,后续学者从技术特征、市场和行业特征、企业特征、公司治理因素^[3]和正式制度环境^[4]等方面深入探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政治关系视角研究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既有文献从转型经济背景下政治关系的制度保障与资源获取^[5,6]双重功能出发,形成了企业寻租观^[7],即认为企业普遍借助政治关系进行寻租——获取政府补贴^[8]、建立政治优势^[9],从而抑制企业创新^[10]。然而,由于结构性、静态性分析视角与衡量方式^[11]的局

[收稿日期] 2016-06-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资本、资源依赖与公司控制权问题研究”(批准号 71472176)。

[作者简介] 赵晶(1976—),女,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孟维烜(1987—),男,河北邢台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孟维烜,电子邮箱:mengweixuan87@126.com。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限,既有研究不仅忽视了动态视角下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创新的潜在激励效应,亦未打开企业政治关系构建过程影响企业创新的黑箱^[11]:①聚焦董事长及高管个人社会资本所形成的企业政治关系^[10],较少关注企业构建政治关系的其他形式;②多以企业本身作为分析焦点^[12],忽略了企业政治关系构建过程中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③强调政治关系的资源获取功能^[10],忽视了政企互动的合法性意义及其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企业构建政治关系必然诱导企业寻租、抑制企业创新吗?与以往基于企业寻租观的研究不同,本文聚焦企业政治关系的动态属性与互动属性,关注动态政治环境下企业构建政治关系如何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即企业构建政治关系是否会激励企业创新、内在机理如何,探究政治关系对企业非寻租行为的正向影响。

政治关系(Political Connection)即企业通过高管参政或与有政治背景的官员建立联系^[13]等方式,与具有政治权力或影响力的组织或个人建立的非正式的政企关系,借以获取政府的支持、影响政府决策。实际上,由于政治社会资本实际效度随制度正式化^[14]与政治网络变动^[12]而动态变化,企业往往通过多种途径动态构建、维护与重塑企业政治关系^[12],获取嵌入政治网络的政治社会资本。在动态政治环境下,企业政治关系动态建构不仅保持、更新政治社会资本的效力^[11],而且在该构建过程中企业还与政府及官员持续互动博弈^[13],从而显著影响企业战略的选择与执行^[15]。既有研究借用Fisman^[16]的“政治关联”概念,以企业高管或董事长的政府工作经历、政治身份及与政治人物的“密切关系”^[17]来判定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忽视了企业政治关系的互动属性与动态属性^[11],因而难以揭示企业政治关系建构影响企业战略的内在机理。政治关系有一定的半隐蔽性且难以衡量^[18],而官员视察作为企业普遍以“请进来”方式^[12]与政府官员互动构建企业政治关系的主要渠道,为探究企业政治关系动态构建过程提供了有效途径^[18]。罗党论和应千伟^[18]等研究从官员视察事件入手,对企业政治关系构建与政府补贴^[18]、合作联盟及企业绩效的表层关系^[18,19]进行了初步检验,为本文揭示企业政治关系构建的创新影响提供了研究线索与理论基础;同时,官员视察对海尔、汉能等企业的创新激励则为本文提供了充足的现实基础。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①在理论分析企业政治关系构建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后,分析检验了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政治关系研究“寻租观”的不足。②在考虑企业特征的影响后,从中国现实政治环境出发,进一步分析检验了政治不确定性对官员视察的创新激励的抑制作用。③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和政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提供一定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基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机理

一般而言,企业战略选择受制于企业资源基础与战略经营导向^[20];而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还面临外部资源高度依赖^[20]和信息不对称^[21]劣势。因而,实施长期价值导向的战略选择要求企业既要避免对特定资源控制者过度依赖,又要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合法性水平^[22]、建立权力优势^[23]。

合法性即关于在由某些规则、价值、信念及定义社会性地建构的系统中哪些主体行为是恰当的、合意的或期望的一般化认知及假定^[24]。合法性不仅体现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对企业战略行动所施加的制度性压力^[22],亦是一种可被行动者通过管理控制与社会性互动主动建构并动用的稀缺资源^[25]。实际上,承载行动者个体特征的客观信息,是外界形成合法性判断的重要依据^[22,24]。合法性既是权力的基础^[25],也可通过权力信息的展示得以巩固^[26]。因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获取外部环境信息、策略性地传递有利信息,有利于企业提升合法性,即增强关键利益相关者的理解、认可与支持;而随着利益相关者认可与支持水平的提高,企业资源获取成本逐渐降低、企

业短期风险抵御能力逐渐增强,进而为企业实施培育技术竞争优势的创新战略创造必要条件。

企业政治关系的本质在于,企业对其所嵌入的政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动用。由于社会资本的成本性与互动性^[11,12],企业往往需要动态构建政治关系以保持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在制度保障^[27]、资源获取等方面的功能^[14]。同时,企业通过与政府及官员等高权力行动者互动构建政治关系,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合法性、形成权力^[23]——获取外部政治环境信息、传递企业政治关系信息——控制企业战略政治风险^[23]、降低外部资源获取成本。所以,除了获取政府补贴、扶持政策,企业构建政治关系还会通过信息机制提升企业的合法性,影响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资源投入。

(1)政治关系构建过程便利企业获取外部政治环境信息^[18],例如政策变动、官员人事变动。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正式制度安排及执行力度存在较大弹性,并受到主政官员异质性的显著影响^[28];而政府还具有判定企业行为是否正当、合法的强话语权^[9,12]。企业与政府官员持续互动,不仅便利获取政府对企业战略选择的态度,进而及时调整战略、增强战略“合意性”以降低企业短期政治风险^[29];还有利于直接争取官员认可与支持^[8],增强企业对风险性创新项目的投资信心。

(2)企业往往将政治关系构建活动作为重要事件,向关键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政治关系正面信息,例如官员视察报道、官员合影或题字^[18]。企业政治关系反映了企业资源动用水平与抗风险能力^[11]。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不仅反映了企业动用政府可控资源的能力,同时传递了政府对企业及其风险行为的重视与“背书支持”。所以,企业构建政治关系的信息,往往被利益相关者解读为企业对政府可控资源的动用能力和政府支持力度的提升,进而增强利益相关者长期资源供应意愿,保障企业创新项目长期资源投入的持续增长。

综上,既有基于静态视角的政治关系研究大多从资源依赖的单一路径解释政治关系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而在现实中,企业与政府官员互动构建政治关系的过程则通过企业合法性机制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与资源依赖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制约,进而从多条路径共同作用企业资源配置与战略导向,激励企业创新。此外,企业政治关系构建过程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在于提升企业的合法性水平;而合法性水平的提升与企业既有合法性地位直接相关。一般认为企业性质与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的合法性地位,所以,企业性质与政治关联状况也会影响企业政治关系构建的创新激励效力。

2. 官员视察与企业的合法性

自秦汉起,政府就开始以“明察”或“暗访”的方式,派遣专门官员探访舆情信息——巡行地方、深入民间、探访民瘼、了解舆情^[30]。一直到现在,官员的视察活动仍然是官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18]。一般而言,视察活动需有政府工作的正式安排与组织部备案,期间要将预定的视察对象、视察形式、视察内容和目的与被视察企业、视察官员进行协调,而被视察企业往往会形成正式的接待方案与汇报内容,例如企业的基本状况,做出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整改措施等。此外,官员与企业也会借助视察契机建立互惠关系。例如,企业常常以举办典礼、承办会议等契机邀请官员进行视察;而为了便利政府工作开展、实现个人利益诉求,官员也会择机选择被视察企业。官员视察对企业战略的作用会受到视察官员影响力、视察目的、视察形式等视察特征影响。例如,相比依据政府工作需要特定企业的例行性视察,企业主动邀请或官员自主选择的视察,更容易引起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注意;相比官员走访或巡视企业,某些专项视察(例如节能减排、员工保护等专项工作)对企业特定行为影响更大、更立竿见影;由于视察过程中政府与企业持续互动、视察官员差异化的经济与信息资源调配能力,官员视察的创新激励还会受到官员等级、视察目的及动机等多重因素影响。现有研究不仅尚未清晰界定官员视察,亦未概括官员视察的基本属性。

作为企业构建政治关系的重要渠道^[18],官员视察具有明显的互动属性与动态属性:一方面,视

察活动得以成行并对企业战略产生影响,其根源主要在于企业与政府及官员之间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各方的互动诉求共同塑造官员视察的动机、目的、形式与过程属性;另一方面,与强政治关系带来的稳定结构不同(例如行政隶属关系),官员视察会因各方目标与偏好的变动而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企业可依据当前战略经营的重点与难点以及自身经营状况,动态决策是否邀请特定官员进行视察而不必承担定期接待官员的义务。基于当前中国官员体系与活动的特点,本文结合研究目的,将官员视察界定为:基于政府工作、企业意愿与官员选择等多种动机,在各级党政军等权力机关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员,以督导检查专项工作、视察企业特定行为、了解企业概况等为目的而对企业所进行的察看、巡查或考察。

对于视察官员而言,视察活动为官员了解相关企业基本状况、检查企业专项工作、视察企业特定行为创造了机会,进而为重大社会经济政策的出台或调整提供依据。在锦标赛晋升体系下,官员晋升需要官员做出一定的政绩。合理利用视察信息,可以帮助官员科学决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保障社会稳定,进而有利于官员找准工作重点与突破口,快速做出政绩。此外,官员通过视察与企业形成紧密的私人关系,有利于在完成分派任务、树立个人政绩和结交上级官员等方面,争取企业配合与支持、构建或保持个人影响力。对于企业而言,除了便利企业与政府密切沟通、获取政治补贴与政策支持,官员视察还会通过信息机制提升企业的合法性:

(1)官员视察为提高企业战略“合意性”、降低战略决策的政治风险创造机会。在当前制度转型背景下,作为主要的社会资源分配者与制度权威,政府不仅控制了重要的稀缺资源(例如政府补贴、行业准入、地区保护等),同时具有判定企业战略是否正当、合法的强话语权,能够对企业战略选择与执行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在官员视察过程中,一方面,企业通过展示既有成就与发展规划,强调自身对推动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强烈意愿^[18],进一步就自身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予以咨询,以此判断政府对企业与企业战略的基本态度、争取官员的评价与建议,增强政府对企业的了解、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借机深入了解政府政策动向信息、政府人事变动、主政官员为官理念等政治信息^[8],增强企业对政治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29],便利企业及时了解人事变动进而选择性地与政府主政官员建立联系、精确解读政策规定和执行力度变动及其影响^[28],从而适时调整企业战略、降低企业短期政治风险^[28],保持企业合法性地位。

(2)企业往往将官员视察作为正面信息反映企业政治关系背景,争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在转型背景下,企业能否获得政府支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战略的成败^[12]。而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不仅意味着企业动用政府可控资源能力的提升,同时体现了政府对企业及其风险行为的重视与“背书支持”。一般情况下,官员基于当前工作重点选择性地视察企业、了解辖区治下的企业状况,而企业受到视察则反映了政府对企业当前经营与长远发展的重视、认可与支持。官员视察作为企业与政府官员密切互动的重要信息,往往被利益相关者解读为企业资源动用能力与风险抵御水平^[11]的提升,进而正向强化企业政治形象与声望^[31]。

3. 企业的合法性与企业创新水平

在制度环境中,合法性通过群体认知、非成文规范与正式规则影响企业战略决策^[25]。由于超越了群体认知体系与接受程度^[22],企业实施创新性、风险性的战略活动(例如技术创新)容易招致权威组织压制和利益相关者质疑等先动缺陷和认知偏见带来的合法性劣势,继而导致企业战略选择受到企业家及利益相关者的风险规避与短期投机倾向的限制。合法性水平的提升不仅意味着企业对特定认知——图示关联、规范与规则执行水平的精通^[32],还会增强企业政治风险感知与资源调配能力,有利于企业跨越“合法性门槛”,实施创新性、风险性和先动性战略^[22]。

企业通过创新活动积累创新知识与技能、提升研发能力、创造无形资产^[33],实现持续竞争优势培育和企业价值增长^[34]。作为一种风险高、见效慢和可见性低的长期投资战略,企业创新受制于企业资源基础与战略经营导向^[35]。官员视察便利企业获取外部政治环境信息、传递企业政治关系信息,进而提升企业的合法性;而合法性水平的提升则通过直接与间接两种路径减弱企业风险规避与短期投机倾向,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一方面,合法性的提升增强企业对制度变迁和政治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继而增强企业战略决策者对战略安排合意性的“理解”和对实施创新战略的风险承担意愿,降低企业的风险规避与短期投机倾向;另一方面,合法性的提升依赖于企业进一步获取制度权威(这里指政府)的认可与支持,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往往将企业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作为重要参考信息^[9],以此判别企业行为是否正当、决定是否对企业给予更多资源支持。同时,由于企业合法性提升降低了企业实施违法违规行而遭受惩罚的风险,企业非刚性长期风险投资因短期风险突然增加而突然削减的可能性减小^[1],继而保障了企业对创新项目稳定而充足的资源投入。所以,合法性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投资意愿与资源保障,继而激励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此外,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官员视察便利企业在优先扶持政策、政府补贴、技术支持^[18]、宣传评价与专利保护等方面获取政府支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1:官员视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4. 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水平

(1)企业既有政治关系降低官员视察提升合法性水平的效力。既有制度体系既限定企业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身份角色与行为,又通过企业形象与声誉等无形资产为企业提供相关资源保障^[18]。与官员视察相似,企业通过政治参与、聘请退休官员及人大代表等途径所形成的政治关联,有利于提高企业政治地位、获取政府支持、传递政治关系信息,继而降低通过官员视察提升合法性的重要性。同样,作为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国有企业因与政府具有天然联系而享有较高合法性与政治地位。由于国有企业经营关系国计民生及国家政权稳固,国有企业优先享有政府财政及其他优惠政策支持^[10],并且各级政府凭借政府信誉与财政为国有企业债务进行风险背书。故而,官员视察对非国有企业和不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合法性提升效力更强。

(2)企业既有政治关系降低合法性提升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政治关联为企业建立政治保障、获取政府支持创造便利条件^[12],例如行业与地区准入政策、补贴与税收支持和更高的市场占有率^[13],激励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10]。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政治关联还可为企业带来“寻租”和“避险”多种收益,降低企业通过创新建立竞争优势的必然性^[7];合法性的提升更有可能便利企业与政府建立密切互惠的政治关系以获取寻租收益。故而,政治关联会减弱合法性提升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同样,相比非国有企业,主管单位或直接上级政府机关对国有企业资源配置与战略调整过程的干预,导致其自由裁量权明显受限;国有企业较高的政治地位保障了充沛的政治资源供应,再加上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之间更为通畅的交流渠道获取政治信息,继而降低合法性提升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2: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官员视察对不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强。

假设 3:相比国有企业,官员视察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强。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及样本筛选

本文参考罗党论和应千伟^[18],以沪深两市 A 股 2000—2014 年 1669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初

选样本,通过公司网站搜集官员视察信息:①网站信息动态更新,可获取连续年份的新闻信息;②从公司新闻资讯、大事记中手工收集官员视察信息;③剔除因退市造成信息缺失或未披露视察信息的样本企业。最终,收集到 976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 8550 个年度观测数据。

基于创新研究的不同视角,已有研究大多分别将企业研发投入、无形资产与专利作为替代指标衡量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中国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多以获取成本计价、专用性较低,并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商标,进而难以有效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同时,虽然以专利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及创新能力在外国文献中应用极为广泛,但是由于:①中国企业多以先模仿再创新的“逆向工程”进行创新,企业创新水平难以通过专利体现;②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将核心创新成果申请专利会带来极大的技术泄露风险;③企业专利申请多为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难以真实反映企业自主创新水平。所以,本文选择研发投入角度衡量企业创新水平^[36],企业研发投入越多,企业创新水平越高。此外,考虑到新会计准则规定自 2007 年起上市公司对研究与开发费用的费用化与资本化部分分开披露,本文选择 2008—2013 年作为样本年度区间。

本文所用财务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并以如下程序筛选样本:①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②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③检验中使用随机效应规避数据潜在的异方差问题,并使用“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④对于不确定的数据,通过公司年报、RESET 交叉核对,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最后,得到 2008—2013 年 3556 个观测样本(见表 1),其中官员视察样本 1655 个,占总样本的 46.54%。

表 1 样本分布(年份)

年份	视察样本(个)	总样本(个)	占比(%)
2008	95	327	29.05
2009	145	389	37.28
2010	216	570	37.89
2011	325	693	46.90
2012	428	789	54.25
2013	446	788	56.60
总数	1655	3556	46.54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性质与政治关联在该过程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R\&D_{i,t+1}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Inspect_{i,t} + \alpha_j \times \sum control_{i,t} + \alpha_y \times \sum Year + \alpha_g \times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R\&D_{i,t+1} = \beta_0 + \beta_1 \times Inspect_{i,t} + \beta_2 \times Pc_{i,t} + \beta_3 \times Pc_{i,t} \times Inspect_{i,t} + \beta_j \times \sum control_{i,t} + \beta_y \times \sum Year + \beta_g \times \sum Industry + \tau_{i,t} \quad (2)$$

$$R\&D_{i,t+1} = \gamma_0 + \gamma_1 \times Inspect_{i,t} + \gamma_2 \times Soe_{i,t} + \gamma_3 \times Soe_{i,t} \times Inspect_{i,t} + \gamma_j \times \sum control_{i,t} + \gamma_y \times \sum Year + \gamma_g \times \sum Industry + \mu_{i,t} \quad (3)$$

考虑到模型中官员视察与企业创新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37],以及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激励的滞后性,本文使用企业后一期的研发强度 $R\&D_{i,t+1}$ 衡量企业创新水平, $R\&D_{i,t+1}$ 等于“研发费用_{t+1}/营业收入_{t+1}”^[37]。 $Inspect_{i,t}$ 表示 t 期是否有官员视察企业 i ;当企业 i 在 t 期受到视

察时,取值为1,否则取0;同时,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考虑官员影响力、视察时间效应等问题,从而更客观地衡量官员视察事件带来的影响。 $Pc_{i,t}$ 表示 t 期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本文参照徐业坤等^[29]的判别标准:若董事长或总经理曾为或现为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党代表,取值为1,否则取0; Soe 表示是否为国有企业,当企业控股股东为国资股时,取值为1,否则取0。控制变量方面,本文选择公司上市年龄($Listage$)、公司规模($lnasset$)、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为基本控制变量;考虑到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1,3]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引入关键控制变量:大股东持股($Top1$)、股权制衡度($Cr10$)、两职合一($Duality$)、董事会规模($Boardsize$)、公司现金流量($Cash$)。具体变量及衡量指标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及衡量指标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衡量指标
因变量	$R\&D_{i,t+1}$	后一期的研发强度	研发费用 _{$t+1$} /营业收入 _{$t+1$}
	$Inspect$	是否受到官员视察	若当年企业受到官员视察记为1,否则为0
主要解释变量	Pc	政治关联	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党代表记为1,否则为0
	Soe	是否为国有企业	控股股东为国资股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lnasset$	公司规模	公司资产总额对数
	Roa	公司绩效	净利润/资产总额
	$Listage$	上市年龄	当年年份减去公司上市年份
	Lev	财务杠杆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Top1$	大股东持股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Cr10$	股权制衡度	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
	$Duality$	两职合一	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为一人记为1,否则为0
	$Boardsize$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的总人数
	$Cash$	公司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Year$	年份	当年年份
	$Industry$	行业	按照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上市公司行业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 描述性统计

表3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其中所有连续变量均已在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R\&D_{i,t+1}$ 是对企业研发强度(后一期)的衡量,其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0.0266和0.0223,表明2009—2014年所有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均值为2.66%,而不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Inspect$ 是对企业是否受到官员视察的衡量,其标准差是0.4988,说明不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且其与研发投入的相关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官员视察与企业创新高度正相关。 Pc 衡量政治关联,其均值是0.3904; Soe 衡量是否为国有企业,其均值是0.3993,说明具有政治关联或为国有企业的企业在样本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相关系数方面,除了大股东持股($Top1$)、公司现金流量($Cash$),其他控制变量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性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4. 企业创新的t检验

表4报告了企业创新的t检验结果。通过比较官员视察样本与非官员视察样本的研发强度均值差异发现:官员视察样本的研发强度比非官员视察样本高0.0025,且两者差异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p<0.01$),说明企业创新水平在企业受到官员视察后确实显著提高。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中位数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相关系数
$R\&D_{it}$	0.0223	3556	0.0266	0.0249	0.0002	0.1317	—
$Inspect$	0.0000	3556	0.4654	0.4988	0.0000	1.0000	0.0508***
Pc	0.0000	3555	0.3904	0.4879	0.0000	1.0000	0.0088
Soe	0.0000	3556	0.3993	0.4898	0.0000	1.0000	-0.2420***
$lnasset$	21.4694	3555	21.5943	1.0187	19.7931	25.0181	-0.2004***
Roa	0.0418	3555	0.0434	0.0503	-0.1458	0.1921	0.1646***
$Listage$	5.0000	3556	6.7047	5.6427	0.0000	20.0000	-0.3287***
Lev	0.3988	3555	0.4013	0.2112	0.0435	0.9024	-0.3784***
$Top1$	33.5821	3556	34.9626	13.8928	9.0000	69.2241	-0.0189
$Cr10$	0.6996	3555	0.8635	0.7180	0.0411	3.4935	0.1816***
$Duality$	0.0000	3528	0.2585	0.4378	1.0000	2.0000	0.1180***
$Boardsize$	9.0000	3532	8.9428	1.6206	5.0000	15.0000	-0.0989***
$Cash$	0.0353	3555	0.0372	0.0658	-0.1471	0.2305	0.0027

注:①“相关系数”是指研发强度与相应变量的相关系数。②***、**、*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表 4 企业创新的 t 检验

变量	非官员视察样本	官员视察样本	均值检验
$R\&D_{it}$	0.0255	0.0280	0.0025(t=3.00)***

注:①所有变量定义参照表 2。②***、**、*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潜在影响^[37,38],本文分别使用水平模型与变化模型进行检验,依据全样本和分组样本检验假设 1—3,即检验官员视察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企业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其中,水平模型中的研发强度与官员视察以原值表示,变化模型用差分表示;表 5、6 分别报告了假设 1—3 的检验结果。

表 5 中(1)—(8)列分别报告了水平模型与变化模型下全样本回归结果。具体而言,(1)—(4)列报告了水平模型在不加入与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5)—(8)列则报告了变化模型的回归结果。根据(1)、(2)、(5)、(6)列结果显示, $Inspect$ 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研发投入在官员视察后确实显著上升,假设 1 得到证实。表 5 中(3)、(4)、(7)、(8)列分别报告了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交互项 $Pc \times Inspect$ 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治关联显著抑制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效力,即相比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官员视察对无政治关联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大,假设 2 得到证实。如表 5 所示,本文发现虽然 $Inspect$ 的系数显著为正,但系数较小。为进一步分析官员视察的创新激励效力是否因企业性质而出现显著差异,本文在表 6 中分别以全样本和分组样本检验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

与表 5 相同,表 6 同时报告了水平模型与变化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6 的全样本检验结果所示:(1)、(2)列的交互项 $Soe \times Inspect$ 的回归系数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5)、(6)列的交互项 $Soe \times$

表 5 假设检验的主要回归结果(1)

解释变量	水平模型				变化模型			
	(1)	(2)	(3)	(4)	(5)	(6)	(7)	(8)
<i>Inspect</i>	0.0008* (0.0004)	0.0009** (0.0004)	0.0019*** (0.0005)	0.0018*** (0.0005)	0.0008** (0.0003)	0.0008** (0.0003)	0.0017*** (0.0004)	0.0016*** (0.0004)
<i>Pc</i>			0.0012 (0.0008)	0.0005 (0.0008)			0.0001 (0.0004)	0.0000 (0.0004)
<i>Pc×Inspect</i>			-0.0028*** (0.0008)	-0.0024*** (0.0008)			-0.0022*** (0.0007)	-0.0021*** (0.0007)
<i>lnasset</i>		-0.0006 (0.0005)		-0.0006 (0.0005)		-0.0000 (0.0002)		-0.0000 (0.0002)
<i>Roa</i>		0.0031 (0.0055)		0.0028 (0.0055)		0.0373*** (0.0054)		0.0372*** (0.0054)
<i>Listage</i>		-0.0010*** (0.0001)		-0.0011***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1)
<i>Lev</i>		-0.0157*** (0.0022)		-0.0155*** (0.0022)		0.0009 (0.0015)		0.0009 (0.0015)
<i>Top1</i>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2)
<i>Cr10</i>		-0.0012 (0.0007)		-0.0012 (0.0007)		-0.0006 (0.0004)		-0.0006 (0.0004)
<i>Duality</i>		0.0003 (0.0006)		0.0003 (0.0006)		0.0011** (0.0005)		0.0011** (0.0005)
<i>Boardsize</i>		0.0001 (0.0002)		0.0002 (0.0002)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i>Cash</i>		0.0000 (0.0033)		-0.0001 (0.0033)		-0.0067* (0.0036)		-0.0069* (0.0036)
<i>Cons</i>	0.0200*** (0.0036)	0.0484*** (0.0123)	0.0194*** (0.0036)	0.0463*** (0.0123)	0.0013 (0.0029)	0.0003 (0.0060)	0.0014 (0.0029)	0.0001 (0.0060)
<i>Industry</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i>Year</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i>N</i>	3556	3504	3555	3503	2843	2811	2842	2810
<i>Within R²</i>	0.0939	0.1058	0.0972	0.1085	0.0121	0.0357	0.016	0.0394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置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差。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Inspect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是否为国有企业影响官员视察对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力,但是影响并不稳定。此外,根据(3)、(4)、(7)、(8)列分组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国有企业组,*Inspect* 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对于非国有企业组而言,*Inspect* 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性质确实显著影响官员视察的创新激励,假设3得到证实。

在假设2、3中,企业性质与政治关联等企业特征影响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激励。然而,官员视察具有外生属性,所以,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会影响官员视察的创新激励效力。既有研究认为官员更替往往导致政治不确定性增加^[29]、重塑企业政治关系^[39]、限制官员对企业的干预^[39],然而

表 6 假设检验的主要回归结果(2)

解释变量	水平模型				变化模型			
	全样本		国有样本	非国有样本	全样本		国有样本	非国有样本
	(1)	(2)	(3)	(4)	(5)	(6)	(7)	(8)
<i>Inspect</i>	0.0016*** (0.0005)	0.0016*** (0.0005)	0.0001 (0.0005)	0.0015*** (0.0006)	0.0010** (0.0004)	0.0010** (0.0004)	0.0004 (0.0005)	0.0009* (0.0005)
<i>Soe</i>	-0.0052*** (0.0013)	0.0008 (0.0014)			-0.0000 (0.0004)	0.0005 (0.0005)		
<i>Soe×Inspect</i>	-0.0019** (0.0008)	-0.0019** (0.0008)			-0.0004 (0.0008)	-0.0005 (0.0008)		
<i>Controls</i>	NO	YES	YES	YES	NO	YES	YES	YES
<i>Cons</i>	0.0224*** (0.0036)	0.0490*** (0.0123)	0.0208 (0.0156)	0.0665*** (0.0196)	0.0014 (0.0029)	0.0008 (0.0061)	-0.0012 (0.0100)	-0.0030 (0.0099)
<i>Industry</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i>Year</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N	3556	3504	1387	2117	2843	2811	1138	1673
Within R ²	0.0914	0.1067	0.1849	0.0833	0.0122	0.0351	0.0283	0.0399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置信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差。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尚未深入探讨官员更替引起的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政治关系动态构建的影响。所以,本文在进一步研究中将官员更替引起的政治不确定性作为关键调节因素,继续探讨政治环境的作用。

2. 内生性问题

官员视察并非完全外生事件^[18]。一方面,官员可能会选择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进行视察,企业为了争取被视察也具有增强创新的内在动机,进而导致检验结果面临的官员视察与企业创新之间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另一方面,特定时期政治环境特征可能会限定被视察企业的范围,进而导致检验结果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在以上检验中,本文通过使用“后一期因变量”和“变化模型”将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初步控制。为进一步降低内生性问题对主要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对研究假设重新进行检验。

(1)控制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按照2009—2014年企业研发强度($R\&D_{i,t}$)均值,将样本企业分为高低两组(高组赋值为1,低组赋值为0),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以上研究模型中进行检验,借以减弱官员视察带来的内生性干扰。结果发现,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在考虑到选择性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后,假设1—3依然成立。从2003—2014年的视察信息内容分析中发现:一方面,视察官员不仅包括专项负责特定工作的官员(例如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等官员),还包括大量的主政官员(例如省长、市长等);另一方面,大多视察官员并非仅对企业创新进行视察,环境保护、大型项目建设、党政建设等均会作为重点问题被视察。同时,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性(例如就业与GDP贡献度)、是否属于国家扶持产业均会影响官员对视察企业的选择。所以,在控制了企业创新能力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假设依然成立。

(2)使用Heckman(1979)两阶段回归方法对回归模型(1)—(3)重新进行检验。通过寻找官员视察的工具变量,减弱双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对检验结果的干扰。本文参考罗党论和应千伟^[18]、陈林等^[40],在第一阶段回归中,以企业是否受到官员视察($Inspect_{i,t}$)为被解释变量,以影响官员视察的工具变量与其他相关变量为解释变量,构造Probit回归模型,获取逆米尔斯比率

(Inverse Mills Ratio),然后将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控制变量带入 Heckman 第二阶段回归中,借以检验主效应与调节效应是否依然显著。

理想的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与扰动项不相关”、“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两个条件。政府官员频繁视察、调研企业经营状况与官员所面临的晋升压力具有直接关系。官员晋升压力一定程度上激励官员发展经济^[41]、支持企业改善绩效与战略调整^[18];而上级政府官员同样会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而视察当地企业,为下级官员晋升带来机遇与挑战。同时,前期当地官员晋升压力中的财政盈余均值与当期企业创新之间并无直接相关性,非常适合作为官员视察的工具变量。所以,本文借鉴钱先航等^[42]构造的地方官员晋升指数,选择以城市财政盈余5年均值(2003—2007年)构造的财政盈余指数(*Czyy*)作为官员视察(2008—2013年)的工具变量;其中,财政盈余=(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数据来源于2003—2014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考虑到上级政府对官员的考核通常会采取相对绩效评价,本文遵循钱先航等^[42]的“可比地区原则”处理方法,通过将5年的城市财政盈余均值与省份均值进行比较,当财政盈余均值小于省份均值时赋值为1,否则为0。具体而言,本文将全国315个城市分成普通城市、直辖市与副省级城市三类,普通城市与所在省份的当年均值进行比较;副省级城市与副省级城市当年的平均数相比;直辖市与直辖市均值相比。此外,基于已有文献^[10,18],选择企业上市年龄(*Listage*)与企业上一期的规模(*lnasset*)、盈利能力(*Roa*)作为影响官员视察的重要变量,并控制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Heckman 第一阶段回归模型(4)如下:

$$\begin{aligned} \text{probit}(\text{Inspect}_{i,t}) = & \chi_0 + \chi_1 \times \lnasset_{i,t-1} + \chi_2 \times Roa_{i,t-1} + \chi_3 \times Listage_{i,t} + \chi_4 \times Czyy_i \\ & + \chi_y \times \sum Year + \chi_g \times \sum Industry + \theta \end{aligned} \quad (4)$$

表7分别报告了 Heckman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根据 Wald 卡方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40]所示,本文所选工具变量较为合适,而不使用工具变量的基础计量模型的确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根据 Heckman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所示,财政盈余指数(*Czyy*)、前一期的企业规模(*lnasset*)、资产收益率(*Roa*)分别在5%、1%的置信水平上与官员视察显著正相关;企业上市年龄(*Listage*)与官员视察正向相关,但显著性并不稳定。基于 Heckman 第一阶段的检验结果,本文对 Heckman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进行报告。在控制了逆米尔斯比率(*imr*)后,总样本的 *Inspect* 与研发投入强度(*R&D_{t+1}*)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而交互项 *Soe*×*Inspect*、*Pc*×*Inspect*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表5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同时,逆米尔斯比率(*imr*)的回归系数均较为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以及企业性质与政治关联对该过程的调节作用依然存在。该结果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由于官员视察事件本质上是多方互动诉求的结果,政府工作要求及官员个人选择作为重要的外生视察动机,会在客观上抑制企业动机导致的官员视察内生性。同时,在本文数据时间区间内,国家政治体制与政策的变动具有一定连续性,故而降低了潜在政治环境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干扰(党的十八大后反腐的干扰在下一部分讨论)。

五、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反腐的影响(2008—2011)

反腐运动直接关系官员的升迁与考评等复杂过程,可能会对官员视察企业的政治动机、企业构建政治关系的创新激励等产生干扰。本文参考党力等^[7],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时间节点,剔除2012—2013年度样本以规避党的十八大以后反腐的影响,最终得到2008—2011年度1979个观察样本,其中官员视察样本781个,占总体样本的39.46%。对缩小的观察样本根据模型(1)—(3)重新检验

表 7 Heckman 两阶段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1)	(2)		(3)	(4)	(5)
$\ln asset_{i,t-1}$	0.1260*** (0.0240)	0.0965*** (0.0262)	<i>Inspect</i>	0.0054** (0.0023)	0.0064*** (0.0023)	0.0063*** (0.0023)
$Roa_{i,t-1}$	1.6340*** (0.4340)	1.9610*** (0.4650)	<i>Pc</i>		0.0010 (0.0008)	
$Listage_{i,t}$	0.0002 (0.0046)	0.0086* (0.0048)	<i>Pc×Inspect</i>		-0.0025*** (0.0008)	
$Czyy_i$	0.1140** (0.0538)	0.1890*** (0.0577)	<i>Soe</i>			0.0011 (0.0014)
			<i>Soe×Inspect</i>			-0.0024*** (0.0008)
			<i>imr</i>	0.0054** (0.0023)	-0.0076** (0.0037)	-0.0071* (0.0037)
			<i>Controls</i>	YES	YES	YES
<i>Cons</i>	-2.8610*** (0.5060)	-2.9580*** (0.5660)	<i>Cons</i>	0.0650*** (0.0144)	0.0638*** (0.0144)	0.0657*** (0.0145)
Wald chi ² (P 值)	49.4700 0.0000	225.6900 0.0000	Wald chi ² (P 值)	1608.5200 0.0000	718.6300 0.0000	718.8100 0.0000
Pseudo R ²	0.0112	0.0513	Within-R ²	0.1171	0.1231	0.1224
<i>Industry</i>	Uncontrolled	Controlled	<i>Industry</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i>Year</i>	Uncontrolled	Controlled	<i>Year</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N	3180	3176	N	3503	3127	312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假设1—3,发现回归结果符合预期,且关键回归系数与表5、6基本一致。

2. 固定效应(稳健性标准误)

以上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检验非平衡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因忽视不随时间变化的相关非观测效应(如自然禀赋、经济发展等)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鉴此,本文在控制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的基础上,使用稳健性标准误差降低异方差问题的干扰,对全样本重新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所示,除了在水平模型下包含控制变量的主效应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假设检验的主要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显著变化。

3. 官员影响力

仅将官员视察指标进行0—1处理,可能会忽视官员影响力对视察事件创新激励的客观影响。由于官员职权管辖范围、信息拥有状况、资源配置决定权^[8],往往导致视察官员对企业战略产生不同的影响力,所以,官员等级差异同样会影响视察的创新激励效力。为了更为全面地衡量官员视察事件,本文在戴亦一等^[9]、罗党论和李晓霞^[10]的国家级、省级和地方级等官员等级区分的基础上,将官员视察按照官员等级分别赋值:省级以上为4、省级为3、市级为2、县级官员为1、无官员视察为0,重新对全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果符合预期,且关键回归系数及显著性与表5、6基本一致。

4. 创新激励的持续性

(1)持续的官员视察能否进一步激励企业创新呢?本文参照模型(1),以企业受到连续视察的期数为自变量,分组检验(非连续视察、连续视察两年、连续视察三年及以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连续视察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正相关,其他三种连续视察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检验结果说明,连续视察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从现实情况看,相比非连续视察,官员连续视察并不能显著影响企业获取全新的政治信息、传递较新的企业政治信息,甚至有利于企业建立更加稳固的政治关系进行寻租,进而在激励企业创新上影响小于非连续官员视察。

(2)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只是一次性冲击?在现实中,官员的视察往往会影响企业下一年的投资战略,而这种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呢?本文结合模型(1),分别控制后一期、后两期的官员视察状况(*Inspect*)以检验官员视察对后两期、后三期的企业创新强度是否具有显著影响。结果发现:当期官员视察(*Inspect*)对后两期、后三期的企业创新强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但不显著、为负但不显著;检验结果说明,官员视察事件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具有明显的短期效应,而这种短期效应与视察官员的短期动机以及企业为实现政企互惠的短期政治承诺有直接关联。基于对视察事件的理论分析与视察实践,本文发现,官员视察的持续性越低、动态性越强,其对企业创新的激励越明显;官员视察的创新激励具有明显的短期时效性,激励效应随着年份增长而持续降低。限于文章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能呈现。

六、进一步的研究

1. 官员视察、企业风险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上部分检验了官员视察通过提升合法性、降低企业风险规避倾向进而激励企业创新。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具有风险规避动机和自利倾向^[43]。企业风险破坏企业现金流量稳定性、增加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从而增强企业主及高管的风险规避倾向,继而限制企业长期性、风险性投资选择^[1]。在企业业绩波动导致企业风险增加的情况下,管理层会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抑制业绩波动带来的雇佣风险^[43]。若想证明官员视察确实通过降低企业风险规避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则需进一步检验官员视察是否降低企业风险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所以,本部分通过检验官员视察是否调节企业风险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进一步检验官员视察对企业风险规避的抑制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4:官员视察减弱企业风险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

本部分参照模型(1),基于变化模型^[39]检验企业风险是否抑制企业创新水平,以及官员视察是否减弱企业风险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本文参考李文贵和余明桂^[44],将会计收益波动性(*Std_ROA*)作为企业风险(*Risk*)的替代变量,即样本企业经行业调整后的资产报酬率(*ROA*)在5年内($t-2$ 至 $t+2$)的标准差。为了减小内生性问题对检验结果的干扰,表8仿照表7的Heckman检验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进行报告,其中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含义与指标均与模型(1)相同。根据表8所示,(1)、(2)列企业风险(*Risk*)的回归系数在1%、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风险或企业业绩波动性降低企业创新投入;(3)、(4)列的交叉项 $Inspect \times Risk$ 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官员视察减弱企业风险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假设4得到证实。所以,官员视察确实降低企业家及利益相关者的风险规避倾向,激励企业投入更多资源到风险高、期限长的创新项目,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

表 8 官员视察对企业风险规避的抑制作用

解释变量	(1)	(2)	(3)	(4)
<i>Risk</i>	-0.0143*** (0.0050)	-0.0103** (0.0052)	-0.0162*** (0.0052)	-0.0113** (0.0054)
<i>Inspect</i>			-0.0001 (0.0008)	-0.0019 (0.0008)
<i>Inspect</i> × <i>Risk</i>			0.0228** (0.0028)	0.0181* (0.0098)
<i>imr</i>			-0.0016 (0.0010)	-0.0008 (0.0011)
<i>Controls</i>	NO	YES	NO	YES
<i>Cons</i>	0.0010 (0.0035)	0.0002 (0.0082)	0.0024 (0.0038)	0.0008 (0.0085)
<i>Industry</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i>Year</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N	1716	1692	1675	1654
Within R ²	0.0126	0.0699	0.0095	0.064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2. 政治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

企业与官员互动构建政治关系的行为必然受到政治环境不确定因素^[29]的影响,特别是官员更替引起的政治权力转移^[45]和经济政策调整^[28]。中国官场历来存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文化,官员更替往往意味着企业基于前任官员所建立的政治关系的断裂和失效^[39]。所以,官员更替限制了官员通过配置可控资源对企业战略施加影响^[45],影响企业投资战略的实施^[28,29]。然而,既有研究尚未从政治不确定角度探究官员更替如何影响企业政治关系动态构建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官员视察便利企业获取关键政治环境信息和政府支持^[8],提升政府对企业的了解与认可,降低短期政治风险对企业实施创新战略的干扰;同时向外界传递企业政治关系信息,降低创新资源获取成本。然而,官员更替期间,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可能会减弱。一方面,各级官员利益共享意愿建立在与企业的熟识度之上。官员更替引起的企业政治关系重构^[39]往往导致新政治关系在短期内发挥显著资源效力,进而减小了企业借助官员视察获取关键信息与经济资源以降低企业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政府人事变动往往意味着官员配置可控资源能力的变化^[27],例如,掌握人事变动信息的能力。官员异质性使官员个人偏好影响其政策偏向^[28],主政官员的变动往往导致地区关键人事安排与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28]且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官员更替期间,视察官员为提供企业资源与政治保障的功能以及企业借助官员视察事件传递政治关系信息的有效性均会降低,进而导致关键资源供应者对企业短期绩效波动与经营风险更加敏感。所以,官员更替限制企业通过官员视察及时了解政策趋势以采取有效措施,企业难以有效降低政治风险并控制长期投资成本,进而制约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基于此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5:官员更替减弱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

本部分参照模型(2),检验官员更替是否减弱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考虑到中国“一把手负责制”的现实情况,本文参考曹春方^[28],以 31 个现行省级行政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的省

委书记更替度量官员更替(*gt*)。具体而言,若省委书记在1—6月离任,则将当年记为该省份的更替年份,赋值为1,若在7—12月离任,则将下一年记为更替年份,赋值为1,否则为0;剔除任期低于一年的更替事件后,若按此划分时间段内发生多次更替,计为一次。省委书记更替资料来自择城网和国泰安数据库,另外通过百度和人民网对官员更替事件搜索补充。与表8相似,为了减小内生性问题的干扰,表9承续表7的检验方式,以Heckman检验第二阶段回归形式对该部分检验结果进行报告,其中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含义与指标均与模型(2)相同。如表9所示,(3)、(4)列交叉项 $gt \times Inspect$ 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官员更替确实减弱了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假设5得到证实。

此外,官员更替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是否直接抑制企业创新。表9同时报告了官员更替(*gt*)与企业创新($R\&D_{i,t+1}$)之间的回归结果。如表9的(1)、(2)列所示:在有控制变量与无控制变量两种情况下,官员更替(*gt*)对企业创新($R\&D_{i,t+1}$)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与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官员更替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会直接抑制企业创新。所以,政治不确定性不仅减弱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还直接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

表9 官员更替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

解释变量	(1)	(2)	(3)	(4)
<i>Inspect</i>			0.0012 (0.0021)	0.0054** (0.0023)
<i>gt</i>	-0.0009** (0.0004)	-0.0012*** (0.0004)	-0.0001 (0.0006)	-0.0005 (0.0006)
$gt \times Inspect$			-0.0017** (0.0008)	-0.0016** (0.0008)
<i>imr</i>			0.0002 (0.0034)	-0.0066* (0.0037)
<i>Controls</i>	NO	YES	NO	YES
<i>Cons</i>	0.0207*** (0.0036)	0.0483*** (0.0122)	0.0213*** (0.0043)	0.0640*** (0.0144)
<i>Industry</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i>Year</i>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N	3556	3504	3176	3128
Within R ²	0.0938	0.1067	0.1060	0.124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3. 企业创新的经济结果

本文以上部分重点检验了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以及企业特征和政治环境特征的调节作用,尚未探讨官员视察和企业创新的经济结果,即:本文检验了官员视察与研发强度的关系,而未探讨这一研发强度在提升企业价值上是否具有一定效率。因此,参考罗党论和应千伟^[8],检验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短期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果与他们的发现一致。此外,本文通过检验发现,企业创新虽然会降低企业短期绩效,但是显著提升企业长期绩效(见表10),说明研发投入的增加在提升企业价值上的确具有一定效率。

表 10 企业创新的经济结果

解释变量	Roa		Tobin'Q	
	(1)	(2)	(3)	(4)
R&D	-0.0716 (0.0469)	-0.2017*** (0.0400)	6.5440*** (1.0870)	4.5184*** (0.9490)
Controls	NO	YES	NO	YES
Cons	0.0563*** (0.0115)	-0.1694*** (0.0243)	2.1160*** (0.2647)	12.0367*** (0.6187)
Industry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Year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Controlled
N	3138	3105	3108	3076
Within R ²	0.0770	0.1983	0.4752	0.563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七、结论

鉴于以往研究对企业政治关系研究视角及衡量方式的不足,本文通过分析并检验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初步解释了企业构建政治关系影响企业战略的内在机理。通过对2008—2013年808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3556个年度观察样本的OLS检验及Heckman两阶段检验,研究发现:①官员视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②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官员视察对不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强;③相比国有企业,官员视察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④官员更替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降低了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⑤政治不确定性还直接降低企业创新水平。官员视察所引起的企业合法性提升是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因素,而企业性质与政治关联则影响了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力。本文认为,激励企业创新的关键在于提升企业合法性水平;在动态政治环境下,企业政治关系动态构建过程中合法性机制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发挥重要作用;企业策略性地通过多种渠道构建政治关系,有利于抵御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降低企业寻租倾向,进而激励以提升核心竞争能力为目标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 [1]潘越,潘健平,戴亦一. 公司诉讼风险、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J]. 经济研究, 2015, (3):131-145.
- [2]李兰,张泰等. 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现状、问题与对策——2015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来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J]. 管理世界, 2015, (6):22-33.
- [3]冯根福,温军.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 (7):91-101.
- [4]Chen, Y., and T. Puttitanu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8):474-493.
- [5]Allen, F., J. Qian, and M. J. Qia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57-116.
- [6]McMillan, J., and C. Woodruff. The Central Role of Entrepreneur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3):153-170.
- [7]党力,杨瑞龙,杨继东. 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 (7):146-160.

- [8]戴亦一,洪群,潘越. 官员视察、媒体关注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15, (7):13-25.
- [9]张建君,张志学.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J]. 管理世界, 2005,(7):94-105.
- [10]陈爽英,井润田,龙小宁,邵云飞. 民营企业社会关系资本对研发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0,(1):88-97.
- [11]刘林平. 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反思和测量途径[J]. 社会学研究, 2006,(2):204-216.
- [12]卫武. 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J]. 管理世界, 2006,(2):95-109.
- [13]梅伟霞. 我国转型期政企关系研究[D]. 武汉大学, 2013.
- [14]赵晶,郭海. 公司实际控制权、社会资本控制链与制度环境[J]. 管理世界, 2014,(9):160-171.
- [15]Cyert, R. M., and G. M. James.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1992.
- [16]Fisman, 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91(4):1095-1102.
- [17]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96(2):369-386.
- [18]罗党论,应千伟. 政企关系、官员视察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5):74-83.
- [19]罗党论,李晓霞. 官员视察与企业联盟——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4,(3):3-20.
- [20]王栋,魏泽龙,沈灏. 转型背景下企业外部关系网络、战略导向对战略变化速度的影响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1,(6):76-84.
- [21]Guo,R.J., B. Lev, and C. Shi. Explaining the Short-and Long-term IPO Anomalies in the US by R&D[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06,33(3-4):550-579.
- [22]李雪灵,马文杰,刘钊,董家宝. 合法性视角下的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新企业的实证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8):99-108.
- [23]Pfeffer, J.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Classic Edition[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4]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571-610.
- [25]John, W. M., and R. Bri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83(2):340-363.
- [26]赵晶,张书博,祝丽敏. 传承人合法性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8):40-55.
- [27]Oliver, C.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16(1):145-179.
- [28]曹春方. 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J]. 管理世界, 2013,(1):143-156.
- [29]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3,(5):115-130.
- [30]刘毅. 刍论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9):424-427.
- [31]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A]. Richardson J.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 [32]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M]. London: Sage, 1995.
- [33]Grant, R. M.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 Formulation[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1,33(3):114-135.
- [34]Ettlie, J. E. R&D and Global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Science, 1998,(44):1-11.
- [35]Muñoz-Bullón, F., and M. J. Sanchez-Bueno. The Impact of Family Involvement on the R&D Intensity of

- Publicly Traded Firms[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1,24(1):62-70.
- [36]赵晶,孟维炬.继承人社会资本对代际传承中企业创新的影响[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3):89-103.
- [37]李文贵,余明桂. 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J]. *管理世界*, 2015,(4):112-125.
- [38]黎文靖,池勤伟. 高管职务消费对企业业绩影响机理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4):122-134.
- [39]潘越,宁博,肖金利.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135-147.
- [40]陈林,罗莉娅,康妮. 行政垄断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全行业数据与内生性视角的实证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52-66.
- [41]Edin,M. State Capital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 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3,173(1):35-52.
- [42]钱先航,曹廷求,李维安. 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J]. *经济研究*, 2011,(12):72-85.
- [43]Narayanan, M. P. Managerial Incentives for Short-term Results[J]. *Journal of Finance*, 1985,40(5):1469-1484.
- [44]李文贵,余明桂. 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12):115-127.
- [45]Julio, B., and Y. Yook.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ycle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2, 67(1):45-83.

Impact of Official Inspection 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ZHAO Jing, MENG Wei-xuan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How does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political connection influenc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strategy under dynam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e critical issues that should be revealed in enterprises' strategy research. Official inspection, as one of critical channels for enterprises to build political connection dynamically, affects enterprises' innovation intention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by boosting enterprises' legitimacy——collecting the information of political surroundings and disseminating 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 information, which in turn stimulates enterprises' innov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fficial inspection improves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official inspection's stimulation to innovation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political tie is less significant tha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out political tie respectively. While the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political uncertainty caused by official succession constraints official inspection's positive stimulation to enterprises' innovation. The legitimacy promotion caused by official inspection is the critical factor that stimulates enterprises' innovation. Meanwhile, enterprises' nature and political tie constraint official inspection's positive stimulation to enterprises' innovation. It is denoted that, the key to stimula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lay on improving enterprises' legitimac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enterprises' strategy not onl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n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political connection, but also projecting enterprises' tac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as a whole by tre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building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s the core of the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 enterprises' political connection;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official inspecti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G32 G34 D23

[责任编辑:鲁舟]